

论中国精神的话语力^{〔*〕}

史宏波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中国精神的话语力是指以中国精神为内核的话语对人和社产生的实际作用力。作为中国精神在话语维度的力量表征, 中国精神的话语力包含三个矢量性构成要素, 即有明确方向的解释力、覆盖一定范围的传播力和特定作用点上的塑造力, 三者相互缠绕、渗透, 有机统一, 形成强大合力, 为中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保驾护航。当前, 亟须有效提升中国精神的话语力, 有机统合中国精神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解释好中国精神的内涵; 辩证地设计话语编码和叙事逻辑, 传播好中国精神的价值; 努力推进中国精神话语体系向纵深发展, 塑造好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行动模式, 确保中国精神的“发声”能够真正影响和塑造人与社会。

〔关键词〕中国精神; 话语力; 核心价值观; 基本构成; 提升策略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2. 12. 010

“话语力”这一概念孕育于语言学之中,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在言语行为理论中首次系统地使用了“语力”概念, 可视为“话语力”的雏形。他认为“语力是以言行事行为中包含的某种意图或力量……是语言的一种功能。”^{〔1〕}而话语作为“连续语言”或“言语事件”,^{〔2〕}是内在包含语力的。顾曰国等语言学者最早将“语力”概念引入国内并用于分析话语行为、话语逻辑和话语效果。^{〔3〕}此后, “语力”在与中国文化和语用学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了“话语力”概念。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始引借“话语力”来研究各自学科领域的理论命题, 同时发展了这一概念。徐国民从政治学视角

指出话语权力包含话语权和话语力, 其中话语力是“话语本身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和说服力”,^{〔4〕}其作用需要话语权的保障。冯春海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指出, 话语权强调支配, 话语力侧重认同, “全媒体时代, 媒介建构影响力的路径需要从‘掌控话语权’向‘建构话语力’转向”。^{〔5〕}赵启正则从跨文化传播领域指出话语力更多的是指话语的影响力。^{〔6〕}可见, 不同学科虽然对“话语力”界定的着力点不同, 但都比照“话语权”概念来阐释“话语力”, 话语力与话语权息息相关。目前, 学界形成的基本共识是: 话语权从外在权力关系角度侧重解决发言权的问题, 而话语力则在话语权基础上强调话语影响人和社会的现实

作者简介: 史宏波,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9 年度重点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精神谱系研究”(19AKS106)的阶段性成果。

作用力,是话语的内生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曾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7]这里实质上就是在强调话语力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在掌握话语权的基础上提升话语力,以期实现“有理说得开、说了传得开”的理想效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特别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8]中国精神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就弘扬中国精神而言,我们最有话语权,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提升中国精神的话语力,将中国精神寓于有力量的话语载体之中,不断强化中国精神话语影响人和社会的现实力量。

一、中国精神话语力的理解

话语是说话者有目的的思维主动性的体现,^[9]在被创造被理解的过程中,表达和传递说话者的主体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以话语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来界定话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0]“为别人存在”意指话语的作用是获取和交流信息,“为自己存在”强调说话者创设和传播话语的目的是向听话者输出主体意识,但总的来说,话语产生的根源是基于实践的社会交往的需要。现代语言学之父弗迪南·德·索绪尔将实践性的话语视作一种符号系统,借此主张从符号学视角研究话语。米歇尔·福柯深受索绪尔影响,在批判继承索绪尔“话语符号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11]它还“是间断的、偶然的和有形的特殊事件系列”,^[12]是“一种具有自身的连贯和前后相继形式的实证性实践。”^[13]也就是说,话语虽是由一定的概念、规则所架构成的符号系统,

但同时它又超越符号、统合符号和意识,发展成为独立的事件和实践,从而实现话语自身相对独立的实践意义转向。话语之所以能够突破简单的符号化存在,而具有实践意义转向的可能,在于话语的性质和作用是由隐匿在其背后的说话者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所决定的,是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直接现实。因此,话语和价值观念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价值观念是话语的深层内核,话语是传递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因而,内蕴了价值观念的话语,赖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念的选择性而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在历史的、现实的社会交往中能够能动地发挥出“子弹”一般的作用,^[14]有方向、有力量地左右人们的态度、观念甚至行为,天然富有塑造人和社会的力量。

中国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领域的展开和表达,其传承和弘扬无法离开话语单独发挥作用。一方面,中国精神需要通过话语外化其精神品格,实现其精神内涵的对象化。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形式和精神成果,具有“内在性”。这种“内在性”要在交往实践中得以传播和弘扬,必然要依靠一定的工具实现其外化和对象化,而只有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15]的话语才能通过具体形式来实现这一任务。另一方面,中国精神必然要通过话语传承传播其内蕴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话语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充分地表达和展现说话者的意图和目的,激发影响听话者的现实力量。内蕴于中国精神之中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要影响人和社会,供给中华儿女投身伟大实践的精神力量,必然要通过话语的特有功能来实现。这就要求说话者将中国精神的独特性与话语表意的普遍性有机融合,创造创新中国精神话语,外化和对象化中国精神的“内在性”,影响听话者并促其自觉崇尚和内化中国精神,最终实现影响人与社会的目的。说话者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设创新中国精神话语,传递中国精神内蕴的核心价值观并作用于人与社会的

过程,与物理力的作用过程具有相似性,即都是施力者通过施加外力有方向地改变受力者原有状态的过程。说话者运用中国精神话语有方向、有大小的对听话者产生作用,表现出中国精神话语对人和社会的现实影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中国精神的话语力”。

首先,中国精神的话语力遵循“力”的一般规律,可以看作物理力在话语实践中的隐喻扩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往往会自发而为,表现出明显的主观性。因而,建构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需要发挥中国精神话语力的规制作用。话语力发挥规制作用的过程依循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代表伦纳德·泰尔米所提出的“力量—动态”模型,该模型将话语交际中的对象双方抽象为两个相互博弈的力量实体:原力实体和对抗力实体。^[16]中国精神的话语力施加于听话者,进而形塑听话者精神世界的过程,恰是中国精神的话语原力作用于听话者自身原有的精神对抗力的过程,前者通过传达中国精神的内涵和品格,试图克服听话者本身固有的非主流精神惯性,促进听话者找到精神依归、形成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社会范围内构建更美好的精神家园。因而,中国精神的话语力的作用规律也就体现为“力”的矢量性,由方向、大小和作用点构成的矢量三要素,合力保障中国精神话语力在二力博弈中取得优势,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精神的解释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说话者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生动解释好中国精神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和实践特性,不仅从历时性视角传承中国精神的传统禀赋和贡献,更要在共时性维度联系时代发展的新条件阐释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和价值,促使听话者习得中国精神,对中国精神及其背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形成全面、完整、正确的认知;二是中国精神的传播覆盖范围要不断扩大,说话者要用亲和的、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语传播中国精神,同时依循听话者的特点、行动模式等

精准施策、有效传播,为听话者营造良好的话语环境,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感知、接受、传递中国精神的力量;二是中国精神的作用要落实到听话者身上具体的作用点位,塑造好人们的精神信仰和行动模式,说话者要运用话语激励人们发自内心地体悟和践行中国精神内蕴的核心价值观,自觉认同和内化中国精神的价值内核,从中汇聚起接续奋斗的磅礴力量。

其次,中国精神的话语力的产生以话语权为基础和前提,是建立在话语权之上的话语影响力,是保证中国精神的话语“被受众听进去”^[17]的能力。这里的话语权是说话者合法合理地表达和传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品质,以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风尚的权利和权力。说话者掌握话语权,能够保证中国精神话语的“有”。但有话语、有声音,并不意味着话语受重视,能让听话者“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18]这之间的差距就需要依赖话语力来衔接和补充。话语力通过内在地提升话语质量和优化话语的表达、传播方式,解释好、传播好中国精神,它能够保证中国精神话语的“能”,能够促使中国精神话语发挥去除听话者精神迷误和行为阻力的实际作用,在结果层面上显现出对听话者的塑造力。

再次,中国精神的话语力在作用过程中与实践相互缠绕,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一方面,中国精神的话语力源自实践,需要社会实践的持续滋养。中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与生活中生发出的精神品格和精神信仰的总结和概括,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客观存在的依据,并非“假大空”的主观臆造。因而中国精神的话语力以中华民族的实践为坚实基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共同赋予中国精神的话语力以支撑和底气。另一方面,中国精神的话语力作用于实践。正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沃纳·赛弗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所指出的:“媒介传播中最关键的传播力量即是新闻话语”,^[19]它能够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话语通过

承载和传播中国精神内蕴的核心价值观,熏陶和淳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传导中国精神的磅礴力量。这种影响能够能动地反映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

二、中国精神话语力的基本构成

中国精神的话语力作为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生成的优秀精神成果在话语维度的力量表征,内在包含三个矢量性构成要素:有明确方向的解释力,覆盖一定范围的传播力和特定作用点上的塑造力。三者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相互发展,形成强大合力,为中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保驾护航。

(一)解释力

解释是人们沟通交往的前提性环节。除基于社会“共有知识”或客观规律性的“普遍知识”之外,人们之间的沟通交往离不开解释与再解释的环节。说话者只有运用话语解释、澄清所要表达的概念和内容,引导听话者逐步进入精心创设的语境,方能保证双方在思想认识上具有一致的前提性认知,进而才有精神意志实现同频共振的可能。这为说话者传播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促使话语承载的内容被听话者理解和接纳。说话者解释中国精神是为了引导听话者进入语境,更好地习得中国精神,正确认知、深刻理解精神要义,为信仰和践行中国精神做好铺垫,因而就要求话语具有解释力。中国精神话语的解释力自然就是这种在一定原则和方法的指引下,话语聚焦于中国精神本身,解释好中国精神时所具有的力量。

中国精神话语的解释力并非来自外在的推动力,而是源自中国精神自身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曾特别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0]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给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伟大实践以科学指引,进而也赋予在实践中创

新发展的中国精神以一以贯之的根本内容和随着时代发展而获取的新的生命活力。因而,中国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既承继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格,又不断获取适应时代发展和实践需求的精神元素,中华民族才得以找寻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武器。伟大改革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无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写照,无不是中国精神不断升华的时代结晶。可见,中国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始终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和丰富精神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重特性才赋予了“中国精神话语以解释力,使得话语具有一定的“厚度”,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科学解释中国精神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描绘出中国精神宏大的理论图景和丰富的实践样态,生动阐明中国实践在精神层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在生动实践中创造的精神成果。

中国精神话语的解释力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直接解释中国精神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和实践特性,进而间接解释作为中国精神形成沃土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一般而言,说话者首先运用中国精神话语描绘事件过程、刻画历史事实,将具体的精神内涵放归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之中,从而揭示精神生成的渊源和脉络;其次以通俗凝练的话语挖掘中国精神富含的科学理论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进而传承中国精神内蕴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再次创设话语情境来表达中国精神与实践关联的内涵和意义,揭示中国精神的实践特性和时代价值。通过直接解释中国精神,说话者能够更进一步引导听话者以话语为基点形成有关中国精神的联想,跨越时空地贯连起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和本质内核,感知和理解孕育出中国精神的伟大实践,进而提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传播力

中国精神话语的传播力即是指中国精神话语通过编码、叙事等方式传播中国精神,发挥影

响听话者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的能力和效力。中国精神的传播离不开中国精神话语的传播力,中国精神话语的传播力决定中国精神传播的效力与影响。

中国精神话语发挥传播力的过程包含两个步骤:一是听话者通过说话者的“话语编码”程序被“运输”进中国精神的语境当中;二是听话者在中国精神的话语环境中受话语叙事的驱动,在情节性的话语表达中理解和通晓中国精神的价值和意义,进而接受其影响。首先,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上层建筑,无法以一种“无话语”的形式在时空场域中长久广泛地传播,因此听话者需要依赖中国精神的话语编码进入中国精神的语境,习得中国精神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其影响。中国精神的话语编码本质上是话语对中国精神的总结性复现,其目的是外化、表达和传播中国精神。区别于纯粹的客观映照,话语编码是在一定话语规则和程序的指引下说话者能动地运用话语编辑模式对中国精神的自觉凝练,是将中国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内在地嵌入话语编码之中。同时,由于编码的话语符号不能简单直白地自我指涉,而一定是有层次、有结构地存储精神内涵和价值,故而说话者的编码过程充分展现其自觉的能动性。说话者通过编码简洁、贴切和形象的话语符号,构筑起中国精神的话语表意系统和环境,传播中国精神内蕴的核心价值观,给人民群众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引领。其次,叙事“是人们了解世界、认识社会的基本方式,也是传播者与外界建立认知关系的基本手段”。^[21]说话者在完成对中国精神的话语编码后,通过一定的叙事方式来宣介中国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为中国精神的传播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容支撑。中国精神话语自然要兼顾好中国精神在宏观层面的内容和意义,构建契合听话者接受特点的叙事体系,方能精准、有效地传播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话语的传播力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在现实中广泛传播好中国精神的价值意蕴。说话者一般通过构建话语编码和话语叙事体系,阐

述好、表达好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样态,讲好中国精神的故事,从而实现中国精神和听话者在思想意识和价值框架内的有效互动。由此,中国精神话语能够在传播中最大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更广泛地凝聚起人民群众的精神共识,彰显中国精神促进中国人民接续奋斗、锐意进取的强大动力。

(三)塑造力

以中国精神话语塑造人与社会是弘扬中国精神的终极目的。在弘扬中国精神的过程中,如果说话者不能运用话语对听话者进行精神动员和凝聚以实现“他塑”,人们没有自觉地接受话语,实现自我精神世界乃至行为的“自塑”,那么弘扬中国精神就是一句空话。因而,中国精神话语的塑造力也就是中国精神话语通过表达和传递中国精神的内涵和价值所发挥出的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行动模式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塑造力量。中国精神要通过话语的解释力和传播力获得生命和活力,但最终还要通过塑造人和社会才能实现自身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

中国精神作为“无形”的存在,其塑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有形”的话语。中国精神需要借助话语挖掘、表达和传递内在的核心价值观,立足价值观这一作用点实现对人们精神世界和行动模式的塑造。这种塑造作用得以实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精神在其本质上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同构性。中国精神不是空洞的、缥缈的思想意识,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精神信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22]话语需要在二者同构的价值观维度唤起人们对中国精神的认同,并积极促进中国精神以话语为载体向人们精神世界的“介入性行动”。由此,听话者能从原本相对被动的“观察性站位”转向主动的“参与式站位”,真正融入和体悟中国精神话语,在话语互动中实现“他塑”与“自塑”。因而,中国精神话语通过表达和传递中国精神,能够在价值观层面和听话者产生良好互动,传递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形塑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

中国精神话语对人与社会的塑造大致包含三个阶段,即提请主体注意、获得主体认同、给予主体价值性的引领和塑造。首先,中国精神话语通过解释和说明中国实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品质,吸引听话者注意和引导听话者联想,促使其对中国精神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和实践特性产生正确认知。其次,中国精神话语通过兼具广度和深度的内容传播和意义传播,营造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以期实现听话者对中国精神的自觉接受和认同。最后,中国精神话语通过真正说服人,实现掌握人。通过中国精神话语的解释和传播,人们能够自觉地将中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吸收中国精神的力量并用以塑造自身精神世界和行为实践,进而逐步实现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

三、提升中国精神话语力的策略

提升中国精神的话语力是弘扬好中国精神的关键,既可以有效解释和传播中国精神,又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精神对人与社会的形塑。但在弘扬中国精神的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宽泛化、简单化和外在化中国精神话语的不良倾向,直接削弱了中国精神话语力的实践效果,使得中国精神的话语权被悬置。提升中国精神的话语力,首要任务就是克服这些不良倾向。

(一)克服宽泛化倾向,提升中国精神话语的解释力

从对象上看,中国精神话语的解释力产生于话语对中国精神及其背后伟大实践的解释。丰富的解释对象对话语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话语表达只有彻底才真正具有解释力,即能正确、深刻、生动地解释中国精神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和实践特性。当前,中国精神话语在解释中国精神的过程中存在不够彻底的宽泛化倾向,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具体表现为:一是在理论维度,说话者停留于中国精神的“口号”话语直观,对于中国精神内涵的解释宽泛化;二是在实践维度,

说话者的解释未能充分回溯过往、联系当下、观照未来,对于中国精神的形成逻辑和实践特性的解释宽泛化。

中国精神话语的解释力天然存在于中国精神本身,故要提升其解释力,就要求说话者在话语维度发掘和表达中国精神的优秀品格和丰富内涵,有机统合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全方位增强解释话语的彻底性。中国精神的理论逻辑反映精神内在的理论规定。坚持理论逻辑就要求说话者对中国精神及其背后的伟大实践的解释不能停留于总结凝练好的、宣传式的中国精神“话语口号”表面,将宏大深刻的精神体系降格为简短通俗直白的词句,而要深入剖析其理论本质,在理论维度增强中国精神话语的力量。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时代的国家精神,其在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生成,又给予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以精神动力,激励中华儿女不断创造出“当惊世界殊”的历史伟业。因此,在解释中国精神时,说话者要始终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维度,来分析中国实践,解释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的中国精神,凸显出中国精神的社会主义方向,为解释的话语注入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之魂。

另一方面,中国精神话语归根结底从中国实践中来,在实践中接受考验,并作用于实践。话语只有经受住实践考验,才真正具有解释力。在实践逻辑上,应通过加强中国精神话语和过去、现在、未来全过程实践的充分互动,即解释清过去历史事件中的精神表征、与当下新实践和新思想对话融合、面向未来积极引领社会实践,让中国精神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自洽。如此,话语才能紧紧地贴合实践,反映和表达实践发展的精神要求,彻底地解释实践,以实践的力量增进听话者对中国精神的认同和依归。概言之,说话者在运用话语解释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其内在在精神要义时,要回归到实践的时空场域中,立足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需要,穿透过去、当下和未来解

释中国精神的形成逻辑和实践特性,从而避免话语解释宽泛化。

(二) 克服简单化倾向,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提升中国精神话语的传播力,发挥好中国精神对人们精神追求的导向作用,建设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但当前中国精神话语的传播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影响着传播力的实效。具体表现为:一是传播内容简单化,说话者在面向不同听话者群体进行传播时,个性化的话语编码设计不足;二是传播方法简单化,说话者在构建中国精神的话语传播体系过程中,尚未能很好地兼顾宏观叙事。

从历史经验看,弘扬好中国精神离不开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话语传播体系。当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时空局限,能够将人民群众全体最大化地纳入中国精神的话语传播体系,这对中国精神话语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在宽口径的传播渠道中突出面向不同听话者群体,针对其文化背景和精神需求分众发声,因势利导,构建同一性和特殊性有机结合的话语编码传播体系。同一性是指由官方凝练和编码出外在“形式”同一的中国精神话语,并自上而下传播,这能保证中国精神话语传播在信息膨胀的现代社会中遵循理性、专业的话语策略,保持中国精神内涵、价值和原则的权威性、规范性。特殊性是指说话者在传播中国精神的具体过程中,贴合不同听话者群体的认知范式、话语习惯,具体地编码用于解释和传播中国精神的话语,用以增强中国精神话语传播的针对性、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在不同场合对国内外三十多个群体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过分类指导的要求。中国精神同样应遵循这一要求,针对不同的听话者群体,贴合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精神需求,构建同一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中国精神话语的编码传播体系。

完成对中国精神的话语编码后,说话者要建构一定的叙事逻辑来传播好中国精神。这要求叙事逻辑既要反映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精神要求,也要顾及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大语境下,中国精神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是其特有的文明属性。在此意义上,中国精神是助力中国梦实现的精神动力,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列宁曾指出:“最马克思主义=最通俗和朴实(转化)。”^[23]因此,宏大的精神也要寓于通俗微观的视野之中,按照“落实、落细、落小”的要求,真正为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像空气一样融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也就是,说话者在传播中国精神时不能忽视微观叙事,要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出发,观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将宏大抽象的精神话语有效转换为具体而微的现实表现,完成对中国精神话语故事化、情感化、艺术化的解构与重构,从而融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实现其价值。

(三) 克服外在化倾向,提升中国精神话语的塑造力

提升中国精神话语的解释力和传播力,归根到底要落脚于提升话语的塑造力,在关联人和社会的作用点上发挥中国精神话语对人和社会的塑造作用。当前,中国精神话语在塑造人和社会的过程中存在着外在化倾向,这使得中国精神话语力量不足,对人和社会的塑造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局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引导听话者对中国精神及其内蕴的核心价值观从认识到认同的过程中,说话者往往以理性地传递知识为主,容易忽视感性共振的特殊功用,导致听话者对中国精神及其内蕴的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往往偏重于知识上的获取,而缺乏一定程度上的情感共鸣和外化践行。二是在中国精神话语推进人们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实践力量的过程中,说话者时常忽视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使得话语脱离社会现实而“悬浮化”,削弱了中国精神话语的塑造力。

要克服中国精神话语的外在化倾向,提升中

国精神话语的塑造力,必须要推进中国精神话语体系的纵深发展,提升话语挖掘和传达中国精神内蕴的核心价值观的能力,以价值观为作用点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行为实践。具体来说,一要增强中国精神话语知性和感性相统一的解释与传播,运用话语从情感维度唤醒主体意识,形成深层的情感维度的价值认同。说话者在面向群体性的听话者时,群体理性多数时候无力对抗情感,情感的传递能够有力冲击想象,塑造听话者内心的精神信仰。特别是特殊或紧急情况下,情感层面的精神信仰作为精神世界的潜意识,通常会比纯粹理性认知层面的信仰更为坚定。中国精神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不同于纯粹理性的知识,是知性和感性相统一的存在。因此,要充分利用这种特性,深度把握形式、内容、情感的有机统一,重视通过话语唤起听话者感性的主体意识,使得听话者主动、自觉地去寻找“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从而促进听话者在情感层面形成对中国精神的深度或彻底认同,塑造听话者的精神品质,坚定其精神信仰。二要坚持让中国精神话语回归社会实践、面向现实需要,构建扎根本来、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精神话语体系。中国精神的价值意蕴只有联系现实和实践方显实效,同样地,中国精神话语必须回应社会需要,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方能有塑造力。构建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要求说话者从历史实践中凝练精神话语,运用话语突出阐释中国精神中回应当下社会现实问题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核心内涵,发掘和传达中国精神中促进时代和实践发展的精神力量。总之,提升中国精神话语的塑造力是中国精神发挥对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塑造作用的必然选择,强化话语对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动模式的塑造作用,方能实现中国精神影响人与社会的理想效果。

注释:

[1]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

endon Press, 1975, pp. 153 - 155.

[2] 参见[英]戴维·克里斯特尔主编:《现代语言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1页。

[3] 参见顾曰国:《John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心智哲学》,《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2期。

[4] 徐国民:《话语、权力与社会价值》,《求索》2008年第7期。

[5] 冯春海:《全媒体时代的“媒介话语力”建构》,《新闻知识》2015年第11期。

[6][17] 赵启正:《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力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8][2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46、44页。

[9] 参见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语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9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1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3页。

[12][13] 参见莫伟民:《福柯的话语历史观及其与萨特的歧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4]“子弹理论”,又称“魔弹理论”,提出于20世纪20年代,西多尼·罗杰森将弗洛伊德学说和行为主义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新的宣传理论。这种理论把媒介对人的刺激比作是魔弹打入大脑,能迅速地被受众所接受,直接作用于受众。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16] 参见李福印、高远编:《伦纳德·泰尔米认知语义学十讲》(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Semantics By Konard Tal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69-70页。

[18]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57页。

[19] 陈宁知:《美国话语——传播美国新闻与文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21] 曹幼松:《用“中国话语”展现“中国精神”之魅力》,《光明日报》2021年9月2日。

[23]《列宁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2页。

[责任编辑:刘 璠]